

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九十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的对美交往

张睿壮 刘 丰

摘要: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来,与美国开展交往始终是其对外工作的重要方面。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认识都曾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重大调整,双方之间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的多次磨合。九十年对美交往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关系的宝贵经验,使得我们党能够成功地在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从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以斗争促合作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推进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在客观认识中美力量对比基础上制定务实稳妥的政策,加强双方的交流对话以增进互信,拓展对美交往的渠道。而美国则需要尊重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调整心态,接纳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关键词:对美交往;历史回顾;基本经验;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年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长期开展对外交往工作,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其中,与美国展开交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方面。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认识都曾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重大调整,双方之间经历了从对抗到合作的多次磨合。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受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两大政党长期没有建立直接党际关系,对美政党外交尚在逐步开拓阶段,处理两国间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对美交往的主要方面。回顾中国共产党开展对美交往、处理中美关系的实践与经验,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提供宝贵借鉴。

一、对美交往的历史回顾

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对美交往主要表现为争取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和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并与美国偏袒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以及侵害中国主权、利益的帝国主义行径进行必要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主持制定国家的各项战略、方针和政策,其对美交往方针实际体现在中美两国之间关系从敌视到缓和、从改善到合作的变化历程中。

收稿日期:2011-01-28

作者简介:张睿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天津30007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对外政策、社会科学方法等研究;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冷战后大国关系、国际安全等研究。

(一) 革命和战争时期:1921—1949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外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进行接触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①。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国内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为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建立初步接触奠定了基础。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当时中共中央驻地陕西延安,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接待了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大批西方记者、作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报道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对于打破中国共产党被隔绝的封闭状态,并推动美国以及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争取联美抗日。为了让美国政府全面了解中国的抗战形势,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南方局人员努力开展“半独立的外交”^②,他们利用合法渠道与美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及友好人士广泛接触,并希望促成一些务实的美国驻华外交官赴延安考察。1944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通过不同渠道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的正式报告,后得到美国政府的采纳。1944年7月,由16名军人和2名外交官组成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考察,由此拉开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半官方关系和军事合作的序幕。1944年8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正式确认发展与美国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外交工作的重点,指明对美政策不仅在于合作抗日,还在于争取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承认与援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③。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外交合作与斗争,其间中国共产党人冷静观察形势发展,在谈判桌上灵活但不失原则地阐述了对未来中国的构想并表达了希望同美国进行友好交往的愿望。

从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到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在国共合作走向破裂、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日益明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也从争取友好为主转为批评、斗争、防范为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的严正立场,对美国在“调处”国共内战掩护下扶蒋反共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实行友好合作。但是,美国从维护战后在华特权利益出发,在对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和政局发展趋势作出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坚持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以大量经济、军事援助支撑国民党政权,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走向敌视和对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环境下鼓励和支持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美国学习深造,这些留美学生分别于1945年和1949年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在美工作领导小组”和“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解放前后动员、组织大批中国旅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978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对美交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处于对抗状态,中国共产党针对美国对中国的孤立、遏制政策展开了坚决的斗争;20世纪60年代末至1972年,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审时

①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② 陶文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14—318页。

度势调整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出现缓和;1973年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通过双方建立起事实上的外交渠道继续接触、谈判与斗争,为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扫清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主张在平等、互利与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升级,美国制定了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和进攻态势,军事封锁台湾海峡,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逐渐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导致双方始终处于敌视和对抗的非常状态。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中直接兵戎相见,在越南战争中间接交火,在台湾海峡也形成了严峻的武装对峙。

6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和对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外政策。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苏同盟关系名存实亡。中共九大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元帅对国际形势进行研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形势的看法》的报告得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结论,并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①。毛泽东随后制定了反对苏联霸权的“一条线”战略,奠定了中美联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基础。

在共同威胁的促使下,中美两国恢复交往。1971年4月10日,中美“乒乓外交”结束了两国人员交往隔绝22年之久的局面,随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两国发表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重新打开。此后,中美双方互设联络处,为正式建交做准备。但受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影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迟疑不决,不断摇摆,直至1978年底才接受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建交三原则。中美双方于1978年12月16日共同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至今

1979年至1989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中美建交之后,在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中美之间的关系全方位展开,在军事交流合作、对华武器销售、双边经贸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1979年初邓小平出访美国,与卡特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合作协定,以推动双方在农业、能源、空间、卫生、环境等领域以及管理、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这一时期,尽管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迥异,但两国在安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进行了广泛而密切的合作^②。然而,发展中有曲折,特别是台湾问题。1979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经卡特总统签署后生效。该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了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中美两国政府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八·一七公报”,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作出了分步骤直至最后解决的规定。但是,美国政府后来因国际形势变化而出尔反尔,背弃承诺,至今一直坚持对台军售,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环境急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苏联威胁的消失导致中美两国失去合作的战略基础,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六·四”风波后,美国以人权问题为名对华进行全面制裁,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的恶化和倒退。而此后的几年,美国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两国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摩擦

^①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72—87页。有关这段历史的详细回忆可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附录一。

^② 对于这一时期中美合作的细节,参见 S. Mahmud Ali, *US – China Cold War Collaboration, 1971 – 1989*,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不断。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在 90 年代还发生了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炸馆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政治军事危机。

2001 年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上台,对华强硬派占据了美国决策层的核心,曾一度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调整战略部署遏制实力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国。但“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心,为了获得中国在反恐、防扩散等方面的支持,小布什政府作出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调整。而中国也给予美国大力支持,在美国反恐全球攻势、应对朝核危机和伊朗核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协调与合作。小布什政府随后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方”,中美关系重新回到相对稳定的轨道。

2009 年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中美关系曾有良好开局。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改革全球金融体制、气候变化与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都表现出合作姿态。2009 年 11 月奥巴马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然而好景不长,2010 年初开始,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售、达赖访问、“谷歌事件”、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人权状况、黄海军演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无视中国利益的做法,导致 2010 年的中美关系陷入低谷。2011 年 1 月 18 日至 21 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强调中美致力于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迎来中美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新契机。

近年来,在推进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对美交往在党际交往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2008 年美国大选时,中国共产党首次派出 2 名观察员出席美国民主党党代会并与奥巴马外交政策团队进行交流。2010 年 3 月,首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对话由中联部部长王家瑞与美国民主党代表、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共和党代表、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威廉姆森共同主持。同年 12 月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是美国两大政党第一次邀请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赴美访问。政党高层对话的举行开辟了中美两国政党直接交流沟通的新篇章,预示着两国政党交往迈向机制化。美国政党轮替和选举政治对中美关系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加强交流,有助于培育更多对华友好精英人士,与一些资深政要建立良好的关系,开拓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有益渠道。

二、对美交往的基本经验

建党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对美交往和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美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美交往的总体态势。准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不断变幻的国际局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时制定和调整对美战略和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密切关注远东地区力量对比和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华北事变后,由于美日在远东的平衡被日本打破,彼此矛盾尖锐,毛泽东提出中国有可能与美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938 年 10 月后,由于美英等国采取绥靖日本、牺牲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美国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了严正揭露和批评;1941 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已经界限分明,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与美英及其他国家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得到美英等国的响应。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面对苏美

加紧争夺世界,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形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确定“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将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积极改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引起了连锁反应,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风云突变、外部环境乱象纷呈的形势下,邓小平对国际格局和时代特征做出准确判断,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既避免中国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也限制了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①。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与合作是时代潮流的判断,在强调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性问题等方面的变化导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全面分析、通盘考虑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②,将处理与美国在内的大国关系置于对外关系布局的第一位,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

第二,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对美交往的基本目标。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根本因素。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对美交往的基本目标,双方之间利益的契合与冲突是过去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曲折前进的根本原因。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中流砥柱,为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而斗争。从最初制定“抗日的外交政策”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十分强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坚决地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内部事务,努力争取外援但不完全依赖外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处理同苏联等友好国家的关系,还是处理同美英等国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都始终立足于本民族的最高利益,不屈从于任何大国的强权和压力。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摆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与美国相抗衡,是基于国家利益做出的理性选择。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越过三八线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表明了不畏强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中苏分裂后,还是出于国家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共产党才能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结束与美国的隔绝状态,与美国联手制衡苏联霸权,避免中国处于美苏的夹击之中。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是困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美对峙的二十多年间,反对美国将台湾永远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是中美斗争的焦点;中美关系正常化期间,美国不放弃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大大阻碍和延缓了两国建交进程;中美建交后,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仍然是制约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中国政府没有留出任何退让的余地。

从国家利益出发意味着处理国家间关系要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尊重彼此的差异。回顾中美交往的历史可以发现,意识形态曾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中美关系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往往是双方政策受意识形态左右最为严重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战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值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 有关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外交布局的认识和调整可参见,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

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美国外交决策者仍然坚持冷战思维,试图将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为中美关系设置障碍,到头来只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美交往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双方的利益汇合点,才能促进中美两国的合作和共同发展。

在革命年代,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对美政策的主要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自主外交与国民党屈辱外交的根本区别所在。早在1944年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我们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排外和惧外、媚外两种错误观念,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外方针的精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是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在涉及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上毫不含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②1989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内政横加指责和干涉,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表示:“国家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③

中美经贸关系被喻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④。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平等互利原则,同美国发展经贸合作关系,互通有无,共同发展。经贸合作应当互惠互利,既要谋求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利益。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美两国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彼此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更需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赢。近年来,美国借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失衡、知识产权等问题对中国施压,并且动辄诉诸贸易制裁和保护等行为。面对摩擦不断的紧张局势,中国方面冷静沉着,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巧妙运用谈判策略,在顾全对我有利的大局的同时对美方做出一定让步,如通过大规模采购减轻贸易失衡,通过大量购持美国国债允许美国资金回流等等,创造并维持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织局面,迫使美国不敢在譬如汇率问题上痛下制裁之手,在贸易、汇率、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成功维持了“斗而不破”的缓和局面,基本上实现了平等互利的“双赢”。

第四,既合作又竞争、以斗争促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策略。

合作与竞争是国际关系中的两种基本状态,通常没有绝对的合作或绝对的斗争。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交往始终是既合作又竞争,在不同时期合作和竞争的比重也会发生变化。无论是在双方以合作为主的时期,还是以斗争为主的时期,“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斗争策略,也是与美国进行交往的基本策略。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们仍然要认清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两面性,不能因为强调“友好合作”、“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而回避必要的斗争。纵观冷战后几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有接触又有遏制。一方面,中美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趋紧密,美国在许多国际和地区事务中需要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以霸权护持为首要战略目标,视中国为潜在的挑战,试图限制中国的发展和利益诉求。中美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除在一些双方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保持合作,强调合作是双边关系的主流的同时,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4—3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

④ 金灿荣:《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2月25日,第4版。

在某些重大战略问题上,中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防范美国做出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并在此种行为发生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要在世界上赢得各国的尊重,要在对美关系中赢得美方的尊重,就必须……显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和无畏气概,在关键时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① 中国共产党对美交往的历史表明,今天中美关系的合作局面不是仅靠良好愿望就能够维持的,而恰恰是以斗争求合作的结果。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都认为两国关系是 21 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对美国的认识,制定对美政策,推动中美双边关系发展。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都拥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增进互信,实现共赢仍然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方向。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应该继续坚持。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客观认识当前中美力量对比及其发展趋势,制定务实稳妥的对美政策。

作为一个大国,认清国际格局及其变化是与其他大国进行互动的基础。冷战结束至今,世界长期处于“一超多强”格局。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的实力尽管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走向绝对衰落,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仍然拥有绝对的优势,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难以对其构成实质性挑战。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实力对比发生了对中国有利的变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但是,我们应清醒认识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在综合实力对比上与美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的发展不是为了在全球和地区层面挑战美国的地位,而是争取自身的发展,努力维护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合理权益。从中美实力对比差异出发,中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待中美关系仍然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同时在争取合理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方面积极有所作为。

第二,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双方的对话机制,在加强交流基础上增进互信。

中美关系在许多领域都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比如,在贸易领域,中美近年来贸易争端频发,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在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在美外汇储备价值等问题一直是双方矛盾的焦点;在安全领域,美国拉拢中国周边国家,强化既有安全同盟并发展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为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和分歧,中美两国需要更好地发挥既有对话机制的作用,加强高层次交往与交流,以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交流互动日益密切,两国建立起 60 多个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涵盖政治、军事、经贸、文教、科技等广泛领域。高层次的对话机制,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和热线、两国战略经济对话的举行、两国各部领导人的会面以及双方在重大国际机构和平台的交流和互动,为解决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渠道。我们应当进一步开拓并合理使用这些渠道,让它们在促进双边关系上起到更有实效的作用。

第三,在开展政府间外交的同时推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拓展对美交往渠道。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党派政治、选举政治、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等国内政治因素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注重同美国政府进行交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入研究和了解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利益诉求和对华态度,通过开展与美国政党之间的交往、对美国国

^① 张睿壮:《不和谐的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66 页。

内的舆论宣传以及多层次的民间往来,形成展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重要平台和国际社会了解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使美国政治家和普通民众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争取主张对华友好和合作的国内力量的支持。中美关系突破政府间外交的局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开展政党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有助于创造中美合作的广泛社会基础。

在强调维持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政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美国总是采取主动提出问题、设置日程、挑起事端的一方”,而中国则往往采取守势,被动应对^①。在处理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②。因此,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也需要美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具体来说,美国应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美国必须理解和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身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尚待解决,其中一些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核心利益,决不容许美国损害。第一,台湾、西藏、新疆问题事关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必须以实际行动恪守尊重中国国家主权的诺言。然而现实是,美国表面上在鼓吹和平的意图,私底下却向台湾兜售武器,口头上承诺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现实中却间接支持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的活动。第二,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涉及国家的根本意识形态,美国应该尊重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同等客观现实,不应该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对方。第三,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及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事关中国的发展权利和国家前途。尽管美国宣称不谋求遏制中国,但是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军事联系,介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这样的做法无疑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美国争取中国融入现行国际秩序毫无裨益。

其次,美国需要调整心态和改革既有国际秩序,接纳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能仅仅指望中国改变和适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等几任美国政府分别对中国做出所谓“负责任的大国”、“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领导角色”等定位,其本质上是希望中国积极参与和维护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首在二战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内核,以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为组织形式。在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背景下,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不完全符合它们的要求,必然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如果美国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参与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争取更大发言权的合理要求视为威胁和挑战,并且利用国际制度和规则压制这些国家,势必加大这些国家与美国主导秩序的冲突。作为国际体系的塑造者,美国应该调整容纳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诉求。

四、结语

在实现民族复兴与国家崛起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理性务实的态度积极发展包括对美关系在内的对外关

① 张睿壮:《中国究竟值不值得美国忧虑?》,《文化纵横》2008年10月号,第55页。

②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长期的对美交往实践过程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善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对美战略和政策,应对中美关系中的复杂局面和突发状况。当前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对双边关系不仅涉及全球范围的事务,也涉及中美两国间诸多共同利益和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解决,既塑造着双边关系的方向和性质,也对全球和各地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只有两国都能以稳健的大国心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彼此尊重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深化对话和交流建立战略互信,才能引领和推动中美关系继续积极向前发展。

The Polic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ward the USA in the Past 90 Years

Zhang Ruizhuang, Liu Feng

Abstract: Si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founding in 1921, its exchang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ts external work. During the years of revolution and war,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 up, the CPC's perceptions o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chang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and several rounds shifts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have occurred between the two sides. A ninety – year history has greatly enriched the CPC's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foreign relations, enables the Party to make right judgment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safeguard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ino – U. S. relations, we should make pragmatic policies based on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 bilateral exchanges and dialogues to enhance mutual trust, and expand exchanging channels between two st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 should respect China's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and major concerns, and adjust its mindset to accept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ise.

Key Words: CPC's Exchang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Retrospect; Basic Experience; Prospect

[责任编辑:陈瑞香]